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Max Weber 的政治社會學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經典講座

執行單位：佛光大學

計畫主持人：鄭祖邦

執行期程：99/8/1-100/1/31

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1 日

一、計畫名稱

98 年度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Max Weber 的政治社會學（計畫編號：MOE-099-01-02-2-21-2-27）

二、計畫目標

本年度的計畫基本上是延續前面兩個年度（97、98）的構想，我們仍是選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著作作為主要的研讀對象。我們希望在未來一年的研讀過程中，繼續將精力集中在韋伯的「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 這個面向，希望在既有的研讀成果上能夠更深化小組成員對韋伯相關作品的認識。

從前面兩個年度的計畫中，我們一直嘗試從國內外韋伯研究的發展，來思考政治社會學此一面向對於理解韋伯整體思想可能具有的意義。首先，從西方韋伯研究的傳統來看，許多學者都指出了政治社會學此一面向對於理解韋伯整體思想具有的特殊意義。例如，在 1964 年時，德國社會學社為了紀念韋伯誕生一百週年，在海德堡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法國社會學者 Raymond Aron 受邀在會中發表了一篇題為〈韋伯和權力政治〉(Max Weber and Power Politics) 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陳「政治社會學」在韋伯整體研究中的意義與特殊性：「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直接受到他對德國和西歐當時形勢的解釋所激發。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有助於我們體認他的主要意圖，即在世界史的燭照之下，來了解我們的時代；或者說，使得以目前的情況為發展頂峰的世界史能為人理解。……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比起《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一書的其它章節更與作者本人的個性密切相連。我認為，韋伯屬於一種因為對政治事務及政治本身有興趣，因而對社會發生興趣的社會學家。」¹此外，德國歷史學者也是韋伯思想的重要詮釋者 Wolfgang Mommsen，在其 1959 年所出版的《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一書中，就主張要把韋伯的問題意識放到韋伯本身的時代來考察，並且認為「民族國家」是韋伯整體研究上最重要的價值關聯：「韋伯的民族概念的性質對於他的政治價值系統來說是具核心性的：對韋伯而言，民族國家的權力是根本的價值，並且，所有的政治目標都要完全服

¹ Aron, Raymond, 1986, 《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烈圖、韋伯》，齊力、蔡錦昌、黃瑞祺譯，台北：聯經。頁 265。

從民族的要求。」²韋伯的學術關懷是與十九世紀德國的國家命運密不可分的，簡要地來看，韋伯出生於 19 世紀後半（1864 年），他歷經了德國統一（1871 年）之後快速的國力發展。然而，德國作為歐洲後進的民族國家，一方面必須面對西歐英、法等先進強國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是新興共產俄國的崛起。如何在這樣的形勢下謀求德意志民族長遠的生存利益，可以說是韋伯殫精竭慮努力思索的課題，他也努力地將德國此種時代的命運融入自身的學術生命之中。正如 Aron 所言：「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與他生活的歷史情境——德國及西方社會的情境——有關。……他將民族的光榮和國家的權力置於一切之上……。他屬於俾斯麥之後的世代，俾斯麥已達成德國的統一，創建了日耳曼帝國。直到韋伯這一代猶保留俾斯麥的遺產，而韋伯認為他這一代所承擔的新任務乃是參與世界政治。社會學家涂爾幹相信國家的軍事功能已經過時了，韋伯則不認為如此。他相信列強將不斷地互相傾軋……他所注意到的當時的社會問題——如德國東部波蘭人民的問題——都是根據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即日耳曼的強大。」³

從台灣學界韋伯研究的發展來看，對於政治社會學這一部分的關注也是較為不足的。從八〇年代的韋伯熱以來，學界主要的關注焦點就放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命題上，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對於「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討論。此一議題除了社會學者（包括當時受邀來台的美國社會學者 Peter Berger）在史學界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余英時在 1987 年發表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韋伯的思想也透過此種跨學科的對話方式掀起了台灣學術界的一股熱潮。除此之外，東海社會系以高承恕教授及其學生為核心的學術圈，也試圖結合年鑑學派的的史學傳統，對韋伯進行了一種偏向物質生活或唯物面向的歷史社會學討論，成為台灣韋伯研究的另一種形式。以這兩條過去重要的台灣韋伯研究傳統來看，政治社會學的部份一直未構成討論的重心，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此一研讀活動來強化台灣學界對韋伯相關討論的認識。

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到，晚近西方學術界對於韋伯研究的基本傾向是日益強調，對韋伯的研究必須從釐清韋伯本人的文本脈絡和思想歷史背景出發。秉持著上述的想法，在第一年的研讀過程中，我們已研讀完畢的部分為韋伯 1890 年代的重要作品”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一文，以及，韋伯晚期重要的另一作品”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基本上，透過這兩篇韋伯前後期相當重要的政治社會學文本，協助了讀書會的成員對韋伯整體政治社會學的輪廓能夠形成一個雛形。在第二個年度，則是以韋伯《經濟與社會》一書中政治社會學的相關章節為主，在章節的挑選上，我們暫時排除了「支配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domination）這一部分的討論。儘管支配社會學可以說是韋伯政治社會學中核心的內容之一，不過，由於這一部分在社會學的討論中較為受到重視，也獲得了許多的討論，所以，我們是將重心轉移到其它仍具重要性但卻較受忽略

² Mommsen, Wolfgang J., 1984,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48.

³ Aron, Raymond, 1986, 《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烈圖、韋伯》，台北：聯經。頁 274。

的章節，主要包括了'Ethnic Groups'（第二部份第四章）、'Political Communities'（Pp.901-940）（第二部份第八章）等章節，下半年度也即將再進行'Die rationale Staatsanstalt und die modernen politischen Parteien und Parlamente (Staatssoziologie)'（S. 815-868）（第二部份第九章第八節）。

在未來的研讀過程中，我們也將會繼續透過其它文本的閱讀，來檢視上述所發現到的一些問題意識。我們也希望經由更多文本的討論與閱讀，能將上述的討論成果繼續深化、擴大。所以，延續著上述的閱讀動機與精神，我們希望下一年度以韋伯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與 *Political Writings* 兩本書的文章為主。*The Russian Revolutions* 一書主要收錄了韋伯 1910 年代討論俄國革命的作品，透過這些作品的閱讀可以除了進一步理解韋伯的政治思想，也可以有助於我們觸及到韋伯對「革命」、「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乃至於對當時社會主義發展的看法。另外，*Political Writings* 一書所收錄的文章包括了韋伯從 1890 年代一直到 1920 年代這三十年間重要的政治社會學作品。這些文章涉及到了相當多當時德國現實政治的討論，包括了「民族國家」、「民主與憲政發展」、「議會制」等等的問題，透過這些文章都相當有助於成員對韋伯相關討論的認識。當然，在第一年度時已閱讀討論過部份文章，本年度將挑選其它尚未閱讀過的重要文章。

主要研讀作品書單如下：

Weber, Max

1994,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三、導讀

在過去半年的進行過程中，主要是研讀韋伯《政治著作選》(*Political Writings*) 一書為主，其中包括了'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The President of the Reich'、'Suffrage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三篇文章。在三篇文章的進行中，分別由鄭祖邦（計畫主持人、佛光社會系助理教授）、黃敏原（中山醫學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葉永文（中山醫學大學教授）、黃信洋（政大社會系博士）等小組成員進行導讀。在研讀過程中，導讀人都會事先針對進度準備大綱摘要，來協助小組成員對於文本進度的討論。在讀書會進行的過程中，也會盡量鼓勵參與同學的發言、討論，培養同學經典閱讀的能力。實際的研讀成果請參閱第四部份的說明。

四、研讀成果

第一部分、讀書會研讀成果

(一) 第一次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0/9/17 1800-210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R101 釣魚台研討室

討論範圍：研讀計畫簡介、進度安排

研讀計畫簡介：

本年度的計畫基本上是延續前面兩個年度（97、98）的構想，我們仍是選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著作作為主要的研讀對象。我們希望在未來一年的研讀過程中，繼續將精力集中在韋伯的「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 這個面向，希望在既有的研讀成果上能夠更深化小組成員對韋伯相關作品的認識。

進度安排：

在未來的研讀過程中，我們也將會繼續透過其它文本的閱讀，來檢視上述所發現到的一些問題意識。我們也希望經由更多文本的討論與閱讀，能將上述的討論成果繼續深化、擴大。所以，延續著上述的閱讀動機與精神，99 前半年度我們計畫將以韋伯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與 *Political Writings* 兩本書的文章為主。

(二) 第二次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0/10/30 1800-210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R101 釣魚台研討室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0-145. (中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 107-120。)

討論內容：

序言

一、韋伯提出的問題

- 1、德國政治機器的性質(the kind of political machinery)與形成國民意志的方法(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will of the state)(134/110)
- 2、國家採取的形式(form)(130/107)
- 3、政治家要根據未來世代來思考統治的技術問題(technical questions of government)(134/111)

二、韋伯的主張

- 1、普選和議會制(132/109)
- 2、客觀的政治學(objective politics)vs.文人墨客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the litterateurs)(133/110)

俾斯麥的遺產

三、俾斯麥的遺產

- 1、俾斯麥統治的惡果：議會和黨派政治家的無足輕重(political nullity)(137/114)
- 2、俾斯麥與民族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138/114)
- 3、俾斯麥不容忍其它獨立並行的權力(140/116)
 - I、軍費評估(the army estimates)：攻擊君主特權(141/117)
 - II、反社會黨人立法(the anti-socialist legislation)(142/117)
- 4、俾斯麥的政治遺產：缺乏政治教育的民族、沒有政治意志的民族、沒有留下政治傳統、沒有權力的議會(144-5/119-120)

(三) 第三次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黃信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時間：2010/10/15 1800-210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R101 釣魚台研討室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45-176. (中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 120-144。)

討論內容：

官僚制

1. 從社會科學角度而言，現代國家恰如工廠一樣也是一種「經營」，實際上這正是它的具體歷史特性。
2. 從歷史上看，向官僚制國家的「進步」，即按照理性制訂的法律進行司法裁判和按照理性設計的規章進行行政管理，在今天是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極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要內在基礎是計算。
3. 官僚制不同於現代理性生活秩序的其他歷史性力量，因為他遠更令人無可逃避……現代官僚制有一個使它的「無可逃避」性質更加明確的特徵，即理性的技術專業化及訓練。
4. 一部無生命的機器就是一種凝固了的精神。只有這一點才能像在工廠中實際發生的那樣給這部機器提供權力，迫使人們為它服務並支配他們日常的勞動生活。然而，這同一種凝固了的精神也體現在由官僚制組織所代表的活的機器中，這部機器的特徵是它的經過訓練的技術性勞動的專業化，它對責任範圍的劃界，它的規章制度以及逐級服從的關係。

政黨政治

1. 政黨在自由招募基礎上形成，這一事實便是對它進行調整的障礙。
2. 政黨可能主要是一種秉持特殊意識形態的政黨，它們的目標在於實現根本的政治理想。
3. 在大規模聯合體的行政中，具有專業素養的常任官員始終是這個行政機器的核心，而它的「紀律性」是獲得成功的絕對前提。
4. 官員應當「置身政黨之外」，這事實上意味著必須置身權力鬥爭之外。為個人權力而鬥爭以及為隨之而來的事業承擔全部個人責任——這正是政治家與經營者的生命線所在。
5. 我們缺少的是一個政治家對國家的領導，這並不意味著需要一個政治天才，甚至不是一個顯赫的政治幹才，而是一個不管在什麼程度上都可以叫做政治家的人。
6. 行政領袖必須直接從議會成員中產生，或者他們需要議會多數明確表示信任

才能繼續任職，至少也必須在失去議會信任時辭職。

7. 一個以消極政治對抗一個統治的官員的被統治者的議會，則示威權國家的變種。
8. 任何議會鬥爭，都是一種不僅涉及客觀對抗性的戰鬥，而且也是為個人權力從事的戰鬥。
9. 議會領袖們追求的並非附有薪金和職銜的官位，而是權力以及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他們也從未認識到，這些領袖只有在議會擁有大批追隨者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 10 政治領袖，尤其是對指導帝國「主席票」負有責任的人—帝國首相兼普魯士外交大臣，必須有可能在其他各邦代表的監督下領導聯邦參議院，同時還必須作為一個黨的投票人和發言人去影響德國國會。
- 11 一切的政治本質就是衝突，就是吸收盟友和自願的隨者；威權國家的官員生涯根本沒有機會去實踐這種艱難的藝術。
- 12 對於現代政治家而言，特定的角力場，卻是議會中的衝突和國內的政黨競爭，而且沒有任何同等價值的東西能夠替代這種鬥爭—這種根本不是為了競爭升遷。
- 13 大批議員只是作為「領袖」的追隨者或組成內閣的領袖的小群體發揮作用，只要這些領袖幹得富有成效，議員們就是只服從。這就是議會的行事方式。「少數原則」（這意味著一個小型領導群體的高度政治靈活性）始終在支配著政治行動。

（四）第四次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0/10/29 1800-2100

地點：宜蘭縣佛光大學 B202 教室

討論範圍：「對卡理斯瑪概念的再思考」

討論內容：

一、提問：如何理解「卡里斯瑪」？

1、「支配社會學」中的卡里斯瑪 vs. 「政治社會學」中的卡里斯瑪

二、在韋伯整體著作中的卡里斯瑪

1、〈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該文的鋪陳結構

2、卡里斯瑪→政治領導

三、Peter Baehr 在 *Caesarism, Charisma and Fate* 一書中的討論

1、卡里斯瑪與凱薩主義：從德國政治到社會學

四、其它相關議題

1、思想史的脈絡：馬基維利與韋伯

現實主義（當代的運用缺乏哲學基礎）— 一切事性（熱情的元素）

我覺得最好去表述事物在實際上的真相，而不是它們的想像方面。

2、對俾斯麥遺產的反省：卡里斯瑪—官僚制

3、訴諸群眾的領袖民主制（plebiscitary leader democracy）與當代政治的反省 「人」的科學（Wilhelm Hennis 在 *Max Weber's Science of Man* 一書中的討論）、政治與價值

「卡里斯瑪政治」(charismatic politic) 與「例外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
(Andreas Kalyvas 在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一書中的討論)

（五）第五次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0/11/19 1700-210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R204 教室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7-196. (中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 145-158。)

討論內容：

一、德國議會的「消極政治」

1、進行批評、抱怨和協商，修改和辦理政府提交的議案(177/145)

2、議會只是被統治者、政治領袖在議會中缺乏天職、國家領袖或官員不是屬於政黨領袖(186-7/152)

二、在「政治領導」與「官僚行政」之間

- 1、德國官僚制的「專業化」(行政獨立)(177/145)
 - 2、政治成就(political achievements)vs.服務業績：「投身政治」就是進行戰鬥、政治領袖處理政治問題(權力政治與文化政治)(178/145)
- 三、一個德國現實政治的關鍵問題：如何使議會能夠掌握權力？(190/164)
- 1、官僚的知識 vs. 官僚的監督：公務機密 vs. 調查權與質詢權、議會的委員會(178-9/146-7)(七人委員會、專門混合的委員會)(182-3/148-150)
 - 2、議會與政治領袖的培育：對英國議會制的推崇(180/147-8)
 - I、官僚政治無法培育政治領袖(187/152)
 - II、職業議員的發展(190-1/154-5)
 - 3、德國政黨政治對議會制的障礙
 - I、社會民主黨：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192-3/156)
 - II、天主教中央黨：特殊世界觀的意識形態政黨(193/156-7)
 - III、非正式的官職庇護權(194/157)

(六) 2010年(99年度)討論內容 12/10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0/12/10 1600-190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R204 教室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7-209. (中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 145-169。)

討論內容：

本次討論內容為延續上次未完成之討論。繼續講述第三個主題—德國現實政治的關鍵問題。

第三點是討論德國現實政治的關鍵問題，也就是如何使議會能夠掌握權力？針對這點韋伯提出官僚的知識和官僚的監督之比較與公務機密和調查權與質詢權、議會的委員會之間的比較(七人委員會、專門混合的委員會)。

其次韋伯提出議會與政治領袖的培育之間的關係，並闡述對英國議會制的推崇，他認為官僚政治無法培育政治領袖，只有職業議員的發展能夠培育出適合的領袖。

再者韋伯討論德國政黨政治對議會制的障礙，他舉出社會民主黨與資本主義

發展的矛盾還有天主教中央黨為特殊世界觀的意識形態政黨，不足以訓練出合適的領袖，另外也提到一些政黨淪為搶奪非正式的官職庇護權的產物。

(七) 2010 年(99 年度)討論內容 12/24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黃信洋（政治大學博士生）

時間：2010/12/24 1600-190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300 會議室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09-233. (中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 169-188。)

討論內容：

現代大眾宣傳的出現使得競選成功要依賴於理性化的政黨組織，即依賴於黨的官員、黨的紀律、黨的基金、黨的媒體和黨的廣告業。

在議會內外都需要一種典型人物：職業政治家，一種至少在觀念上、但多數情況下是在實質上把政黨的經營視為生活內容的人物。不管我們對這種人物是愛是憎，就其目前的狀況而言，他都是大眾選舉背景下政黨政治活動理性化和專業化的必然產物。

有兩類型的職業政治家：一種是在物質上「靠」政黨和政治活動為生，…另一種則是「為」政治而生，他們的資金狀況把他們置於這種地位並受自身信念的驅策，他們在政治中找到理想的生活內容。激烈的政治搏鬥抵消了僵化為政黨食祿者階層的趨勢。

在所有民主化的議會與政黨中，今天對政治經營提出的要求產生的結果是，一種職業作為補充議會成員的基礎，正在上升為一個特別突出的角色，這就是律師的職業。律師相對來說則比較容易從技術和內在要求兩個方面迴旋於他的法律工作與職業政治活動之間。

斷言煽動家越來越重要，就這個消極意義而言往往是準確的，就其恰當意義而言，則是完全正確。唯一具備政治領袖所需素養的人，就是在政治戰爭過程中被擇選出來的人，因為一切政治在本質上都是戰鬥。

能動的大眾民主化意味著政治領袖不再因為他在某個顯貴圈子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被宣布為候選人、然後因為他在議會中的業績而成為領袖，而是意味著他利用大眾煽動手段贏得了大眾對他個人的信任和信仰並獲得了權力。實質上，這意味著對領袖的選擇轉入了凱撒制方向。實際上，任何民主都會出現這種

趨勢，畢竟，平民表決就是一種特指的凱撒制技術。

對於事實上的凱撒式大眾代表，議會的存在可以保證

(1)他的權力地位的穩定性

(2)被控制的性質

(3)維護與他相對的公民法律保障措施

(4)以一種有序的形式通過議會工作使尋求大眾信任的政治家證明自己的能力

(5)凱撒獨裁者喪失大眾的信任時以和平方式淘汰他。

凡是沒有或極少資本的人們，一旦被壟斷性組織起來，對保障未來生計的考慮就變得至關重要。凡是有此傾向的，都會把這一點看做未來的「民主」理想或「社會主義」理想。

如果專業官員由民眾選舉，那麼不僅會出現一個極大的危險，即民眾的日益冷漠，而且他們還會遭到矇騙，無法辨別誰應對弊政負責。但在議會制度下，選民就會直接要求政黨領袖為他們任命的官員負責。如果各個強有力的代表團體的共同支配能夠不間斷地有效維護政治連續性並確保國內秩序的憲法保障，即便出現了一個凱撒式領袖，他也極容易遭到排斥而垮台但又不會帶來國內災變的危險。

政治經營是既得利益者的事業。不是政治上被動的「大眾」產生了他們的領袖，而是政治領袖招募追隨者並通過「煽動」贏得了大眾，即使在最民主的國家形態中也是如此。一方面，議會生涯為懷有政治抱負、權力意志和責任感的人物提供了大好機會；另一方面，只要這些真正具有政治氣質與天賦的人物證明自己能夠贏得大眾的信任，大眾民主的「凱撒制」特徵就會迫使政黨屈從於這些人物。正如可以一再看到的那樣，一個天然的領袖達到最高地位的機會，事實上就是他的政黨獲得權力的機會。「大眾」本身只考慮當下。經驗告訴我們，大眾總是容易瞬間就受到純粹情感和無理性的直接影響。政治上成熟且擺脫了怯懦的民族，其驕傲的傳統總是會讓他們在這種局面下證明自己的膽略和冷靜的頭腦。

(八) 2011年(99年度)討論內容 01/07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黃敏原（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1/01/07 1630-1930

地點：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300 會議室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33-271. (中

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188-217。）

討論內容：

本次討論主題有五大點

第一點是第三節結尾的回顧—不光議會化，總的來說還有帝國實際憲政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並不在於聯邦其他成員的憲法權利，而是在於他們和普魯士這個霸主邦的關係

第二點在講帝國的結構—「普魯士」在聯邦中的霸權地位（大普魯士性質），「國中之國、會中之會：德國議會 vs. 普魯士議會」。

普魯士的特權清單：實際權力 vs. 形式地位

I、聯邦主席的權利、否決立法變革

II、軍隊（皇帝的軍隊）、國防大臣是普魯士官員

III、帝國首相＝普魯士全權代表＝普魯士的外交部長（≠普魯士首相）

第三點是普魯士的政治結構—普魯士的特權階層：普魯士貴族院（上議院的預算決定權）

難題：各邦國（esp. 普魯士）的議會化與帝國政府的議會化

I、普魯士政府的態度 v.s 帝國的局勢

II、普魯士的財閥政治

第四點是帝國內部的官僚機器—聯邦的保護：官僚系統俸祿的保護政策& 靜止的生活：缺乏議會制與民主。

第五點是德國的議會化與聯邦制的健康結合

1、原則：議會化必須導入帝國的航道、聯邦各邦國對帝國政治的影響增強（帝國的政治領導權）

2、健康帝國議會化的前提：憲法第九條的障礙

3、官僚制的憂慮：官職壟斷權、將德國國會的政治地位貶到最小化

4、議會化的目標：選擇領袖的地方

5、三大權力集團的權力平衡：帝國政府與德國國會、普魯士王室政府與普魯士議會、聯邦諸侯與各小邦國議會

（九）2011年(99年度)討論內容 01/17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葉永文（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教授）、黃信洋（政治大學博士生）

時間：2011/01/17 1400-1700

地點：公館新生南路集客茶坊

討論範圍：

Weber, M., 1994,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52-271. (中譯本：2009,《韋伯政治著作選》,〈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 206-217。)

討論內容：

問題是從普魯士與帝國政治的關係上開始出現的。這些問題完全是產生於如下事實：普魯士在帝國內部佔據了一個高度特權化的地位。未來的帝國首相仍將不得不是一個普魯士大臣，但這將不再可能純粹從普魯士內部的政黨格局著眼以決定對主席票的指示又不至造成與德國國會的嚴重衝突。

未來的帝國政治進程，尤其是完全引進了議會制政府之後，也仍將依賴於普魯士在聯邦參議院的投票權與帝國政府的權力之間達成妥協。即使完全實現了議會化，有兩個人物也將始終發揮關鍵作用：一個是皇帝，他同時還是普魯士國王；另一個是帝國首相，他必須同時又是普魯士選民的領袖與內閣成員，實際上通常是內閣首腦。

應當容許目前支持政府的帝國各政黨領袖以及各主要邦國的議會的領袖作為全權代表入席聯邦參議院，從而使它實現議會化。各王朝的繼續存在，不僅從純粹民族政治的角度來看是有益的，而且出於一般的文化政治原因也是可取的。

德國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便從不受控制的官員統治和被統治者習慣於服從那種統治中產生了，因為被統治者並不分擔責任，也不關心官員的工作狀況和程序。只有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能成為「主宰者民族」。一個僅僅能產生優秀的官員、值得欽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和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而在其他方面卻服從於冒牌君主制口號掩蓋下不受控制的官員統治—這樣的民族不可能是一個主宰者民族，他能把日常事務幹的更好，但不會為了世界的命運多費腦子。

(十) 2011年(99年度)討論內容 01/17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黃敏原（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1/01/17 1400-1700

地點：公館新生南路集客茶坊

討論範圍：

Weber, Max, 1994, "Suffrage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in Political Writings. Pp.304-8 (中譯本《學術與政治》，1991，台北：遠流，頁 277-280)

討論內容：

● 文章主要論旨：支持人民直接選舉德國的帝國總統

支持理由：

若要帝國的一統，需要一種不經中介、直接由全民意志為基礎所選出的總統，唯有一種以民意為基礎的總統，才具「權威」來推行「公有化」(行政管理化)

組織緊密而統一的政府將無往不利&專政者的必須性：使國家的經濟可以重構

韋伯在這裡討論官僚化的運作狀況，其背後的推手與動力，卻是一個有民意基礎的准「卡理司瑪」的人所推動。這邊可以看到卡理司瑪與官僚制之間微妙的關係。另外，韋伯亦有思考到若帝國總統成為獨裁者，將可以怎樣抵制：A. 贊成對獨裁者進行絞刑 (懲罰)B. 反對由皇室來擔任帝國總統 (防範)

如此才有「挑選」政治領袖的機會(進而促進政黨改組、打破門閥體制)，使之可以「抗衡」國會這個「民意基礎」(讓兩個有民意基礎的力量去對抗)，有效「對抗」[地域主義]讓帝國更統一。

預防「國會危機」(以前總以為多數意見一定不會錯，不過國會仍舊會犯錯) [以此，總統可以在危急的時候干涉帝國的運作]可與既有的領導階層抗衡：因為具有來自全民的合法性，故可掌握任官權。

做為正當性的行政首腦，總統具任命權、否決權、解散國會權、公民複決權。

(十一) 2011年(99年度)討論內容 01/21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黃敏原 (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1/01/21 1400-1700

地點：公館新生南路集客茶坊

討論範圍：

Weber, Max, 1994, "Suffrage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in Political Writings. Pp.80-91 (中譯本《韋伯政治著作選》，2003，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 66-75)

討論內容：

本次討論主題為－民族政治的關鍵

以「平等選舉權」(equal suffrage)作為政治場域中諸鬥爭實力的一招棋子，韋伯分析此新制度的作用、功能即被(俾斯麥)利用的可能性，民主政治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平等投票權使當選者分享國家權力、並永久發揮作用、此民主派政黨成為民族主義的載體

● 提問：但，韋伯此時的「民族主義」的確切內容又為何呢？

韋伯談民族主義、民族文化與語言於其中的作用、角色，兩組對比的「身份團體」：新財閥階層 V.S. 擁有選舉權的公民。

檢討「階級選舉權」：可以用「教育程度」這個判准取代嗎？詢問是否可以在德國引進「中產階級公民權」(middle-class franchise)。

檢討幾個德國未來在經濟上的前途、與民主選舉的關係：

- A. 經濟工作的高強度與理性化
- B. 德國的食利制度、食利者與信貸資本主義系統

韋伯認為要給承擔經濟工作的工人政治權力、作為民族維繫的重要基礎
這個政治權利正是：「平等投票權」(可能會發生的工人與企業家的對立)

- C. 原料配給的經濟時代的來臨

● 用「利益集團代表機構」(Interessenvertretung)來理解投票制(p.75b)者？
探討在德國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與這個投票至被政治勢力利用的可能(p.76)

(十二) 2011年(99年度)討論內容 01/27 讀書會討論內容

報告人：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1/01/27 1400-1700

地點：公館新生南路集客茶坊

討論範圍：

Weber, Max, 1994, "Suffrage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in *Political Writings*.
Pp.91-99（中譯本《韋伯政治著作選》，頁 75-82）

討論內容：

本次討論有五個重點

第一點為討論目的團體（Zweckverbände）與共同體（Gemeinschaft）之間的關係，還有資本主義經濟與等級經濟和等級制度不能作為當代選舉權的基礎。

第二點為討論政黨作為政治鬥爭的載體，還有職業利益與官職俸祿的比較。

第三點為討論立法機器中的「上議院」（Erste Kammern）還有容納民族政治生活的知識階層代表。

第四點為討論國家所組織利益團體為何失靈？和「自由徵募」的追隨者。

第五點為討論「妥協」作為議會制價值。

第二部份、成果研討會

本讀書小組系於今年元月 14 至 15 日舉辦「台灣韋伯研究學術研討會」，該活動主要是受到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強化創新計畫的經費補助。在兩天的議程中，共計發筆了八篇專業論文，其中的主題含括了韋伯學術思想中許多重要且不同的面向（如：宗教社會學、方法論、政治社會學等）。此外，在會議期間還舉辦了一場圓桌座談，座談主題為「韋伯研究現況探討：從全球到台灣的發展」，由六位學有專精的韋伯研究者分別介紹德國、法國、英美、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各地當前韋伯研究的現況，從世界各國發展的比較中也讓大家可以更了解台灣韋伯研究的進一步方向。基本上，此次研討會可以說相當難得地聚集了當前台灣學界許多重要的韋伯研究者，其中包括了台大社會系的林端和孫中興教授、政大社會系的顧忠華教授、清大社會所張維安教授、清大哲研所張旺山教授、東吳社會系蔡錦昌教授、東海社會系鄭志成教授、資深韋伯中文譯者簡惠美以及本校鄭祖邦、林錚兩位教授等。整體而言，會議的進行相當順利且討論熱烈，與會學者也都十分高興能在本校優美的環境中舉辦這場研討會，在會後大家也都十分感謝教育部對相關活動的支持，並且，企盼未來能夠繼續舉辦這樣的學術饗宴。

研討會議程如下：

台灣韋伯研究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議程

會議時間：100年1月14、15日（週五、六）

會議地點：雲起樓406會議室（4F）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1月14日（星期五）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及主題	評論人
12:50 13:00	報到 開幕	林信華 院 長	開幕致詞	
13:00 14:20	一	孫中興 教 授	林 端：韋伯人性論初探 張旺山：論韋伯的「人的科學」的構想	張維安 林 端
14:20 15:40	二	顧忠華 教 授	黃敏原：『天職觀』入世化的社會學考古： 試探韋伯於〈新教倫理〉中對路德 神學的剖析 林 錚：「新教倫理」：一種傅柯式論述秩 序的重新解讀	蘇碩斌 黃敏原
15:40 15:50	茶敘			
15:50 18:10	三	張維安 教 授	圓桌座談 韋伯研究現況探討：從全球到台灣的發展 與談人： 張維安、孫中興、簡惠美、鄭志成、張宏輝、林 錚	
18:00 	晚宴			

1月15日（星期六）				
10:00 10:30				
10:30 11:50	四	林 端 教 授	顧忠華：以價值自由捍衛學術自由——韋伯 方法論的正解 蔡錦昌：價值自由——韋伯科學觀發微	鄭志成 黃厚銘
11:50 12:50	午餐			
12:50 14:10	五	張旺山 教 授	張宏輝：韋伯論「理性紀律」 鄭祖邦：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對「卡里斯瑪」 概念的再思考	葉永文 何明修
14:10	閉幕			

五、議題探討結論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一文為韋伯發表於法蘭克福日報的政論結集文章。於本文中，韋伯一直在思考如何讓德國變得強大的方法，而他最後得出的結論乃是支持議會政治與全民普選的作法。

本文寫作之時，德國政府處於戰爭階段，因此多數政治家皆把重點放在國外的國際問題上面，然而，韋伯卻沒有如此做，他認為此時德國人民應該關心的反而是國內而非國際政治。韋伯表示，德國人的「政治成熟度」有問題，也就是說，德國人一直未能有效地豎立出一種成熟的政治體制，讓德國人民能夠不需如同羔羊一般，總是需要強人政治的領導才可以壯大，一旦強人突然間殞落，人民便會頓失依賴，無所適從。

當時德國政府的主要權力掌握於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手上，俾斯麥雖然表面上

想要推行韋伯贊成的議會政治，但是，實際上他卻藉由操控議會政治來削弱各黨的實質權力，也就是說，俾斯麥並沒有有誠意地想要豎立議會制度，反而只想要藉由削弱議會權力來壯大自己的力量。

俾斯麥時代的政治領導階級都還是地主階級，有濃厚的地域概念。韋伯認為，德國如果真的要壯大自己的實力，就要變成足以與英美等工業國家對抗的工業國家，因此緣故，就要讓德國的資產階級取代原來的地主階級，成為新的政治領導階層。

韋伯雖然對俾斯麥的政治領導能力頗為佩服，不過，俾斯麥卻沒有在取得權力之後有心於豎立良好的政治體制，反而只醉心於自我權力的壯大與鞏固，因此他便失去了建立良好政治體制的絕佳契機。倘若俾斯麥真的能夠秉持政治家的廣闊胸襟，放心地讓議會體制的政黨政治自主運行下去，那麼，獨立運作的議會政治便可以成為德國人民的國民意志，不會隨著強人政治的消亡而消失，反倒是會隨著政黨政治的成熟而朝向成熟穩健的地步邁進，如此一來，德國人民的「政治成熟」也才有機會出現。

韋伯對於民族國家的關心，主要是因為德國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接連受到拿破崙與俄國的侵擾，因此無論如何他便會對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德國的統一與壯大抱以期待。然而，雖然說韋伯認為民族利益遠高於民主制度與議會制度，不過，他更認為，倘若議會制度與普選制度不能在德國有效地建立下來，由於德國民眾尚未擁有「政治成熟」，總有一天，在強人消亡之後，德國的國立就會再度趨於疲弱。

本文的基本態度是，德國若要強大，就先要由國內的政治制度的改革開始做起，不要僅僅關注國外發生的事件。韋伯對於政治教育的政治責任的強調，本文已經表現地非常清楚：強人政治僅能是一時有效的政治作為，無法有效地解決長遠的問題。唯有透過有效的政治教育，把良善的政治制度建立下來，未來的國家才會有真正的希望可言。俾斯麥雖有能力在絕佳的機會落實議會體制，卻因為政治胸襟的不夠寬闊而把自身的格局變得狹隘，最終僅能扮演一個為求掌權餬口的政客角色，此乃韋伯覺得最可惜之處。

另外在文中也探討了韋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官僚制」來解釋他頗重視的政黨政治理念。

首先，Bureaucracy 一般來說有兩種譯法，意即「科層制」與「官僚制」。「科層制」是比較中性的譯法，強調的是社會組織發展過後的六項特性，通常是描述它的一些正面特質。「官僚制」則是帶有負面意涵的譯法，著重的是社會組織發展過後會出現的種種不良效應，諸如「規則至上主義」、「公文主義」與「異化」均是。

政治社會學的相關論述，對韋伯來說，一直是他本人畢生論述的首要價值關聯，因此也可說是他最終論述的指向之處，由此可看出他極力介入政治現實的宏大信念。不同於馬克思帶有浪漫主義的作法，試圖建構科學化的歷史法則來引導自己的種種社會行動。韋伯的政治介入的立基之處乃是既定的德國政治現實，不

是自己想像出來的歷史指向。

循此觀點，韋伯的說法是，政黨政治雖然有其明顯的缺點，比方說，政黨的組織領導者及其黨員必然有其爭權奪利的一面，才有辦法讓組織繼續存活下去。事實雖然是如此，不過，政黨的存在最重要的核心並非爭取各種利益，而是具有一個宏大的世界觀，也正是此種世界觀有能力吸引願意認同此一理念共同奮鬥的黨員加入，職是，一個只知道純粹理念而不顧及政黨組織生存的政黨，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異想天開，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完全不顧及黨員的生存問題，一意孤行地徹底實行檔的純粹理念。同樣地，沒有任何政黨的存在目的僅在於爭權奪利，因為此種政黨不僅無法吸引有志向的黨員加入，也很快就會受到人民的唾棄與厭惡。

韋伯的想法是，好的制度必然要從政黨政治的鬥爭中出現。「鬥爭」此一眼其中必然帶有「競爭」的正面意涵，不僅是負面的「爭鬥」而已。政黨政治的鬥爭倘若可以樹立良好的議會政治制度，良性競爭與憲政民主的基礎才會穩固。事實上，韋伯並不期待政治天才的出現來領導群眾，畢竟天才出現的機率實在不高，此外，就算政治天才真的出現了，一個不願意承擔政治責任的天才，最終有可能變成一個只知道操弄權勢，不知道樹立政治典範的政客，而這也是韋伯對俾斯麥最大的批判。

韋伯認為，我們不應期待政治天才的出現來領導我們，而是應該期待一位有責任的政治家來引領人們。一位有責任的政治家會非常有熱情於推動憲政民主的確立。因此，韋伯真正的期待便會指向良好政治制度的建立，畢竟，倘若良好的政治體制可以確立，有責任的政治家自然就會接連地浮出檯面，雖然說這仍必須奠基在政黨政治可能惡鬥驚人事實之上，但是，卻也是一種必要之惡。

‘The President of the Reich’一文乃是由韋伯發表於報紙上的政論性文章改寫而成的，當時恰好是威瑪憲法制訂且第一任德國帝國選出的時候，可以看出韋伯對於新任帝國總統所帶有的深度期許。

不同於本讀書會先前討論過的關於「議會化」的文章，把重心放在德國首相的論述上面，本文適逢帝國總統選出，因此韋伯便把重點放在帝國的總統一職上面，並大力支持由人民進行全民普選所選出的帝國總統。韋伯表示，若真想要讓德國帝國達到大一統的境地，就需要一種以全民意志為基礎的民選總統，因為唯有全民直選選出的總統可以真正代表全民的意志。

唯有確立堅實的民意基礎，帝國的總統才會有權力來貫徹改革的意志，因為如此，獨裁者的存在也才會有一定的必要性。韋伯認為，德國人因為具有十分強而有力的官僚組織，因此讓德國人民養成過渡仰仗官僚制度的被動習性，而官僚制度亦因此而有恣意妄為的可能性存在。

官僚化制度與具備卡理斯瑪的領導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關係。首先，德國的官僚制度本身乃是以任務執行的效率為評價的基準，因此乃是一種純粹依照目的而遂行任務達成的一種工具，本身並無認為主觀性可言。其次，領導者若是經

由全民普選後產生的話，此種領袖想當然必然具備某種奇異魅力才可以獲得人民的信任。此種全民總統在取得民意支持的情況之下，便可以有權力把自己的意志施行在官僚體制之上，讓官僚化制度有機會朝向更好的境地邁進。如此一來，民選總統便有能力與國會達成某種程度的勢力均衡，可以面對來自議會的強大壓力。

韋伯之所以要鼓吹民選總統的重要性，原因就在於，代表多數意見的國會也是會有犯錯的可能性，因此，爲了要制衡國會運行可能犯下的錯誤，帝國總統就必須有權力在必要時刻挺身來干預帝國議會的運作。此外，由於民選總統具有來自全民的合法性權力，便可以與既有的社會領導階層相對抗，從而有機會化解既得利益階層對於實質利益的過度壟斷。

‘Suffrage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一文中，韋伯表示，平等選舉權已經可以是一種普遍且無法扼抑的世界趨勢，隨著德國的民主化進展，即便說保守的政治領袖可能會想要遏止此種趨勢的出現，不過，隨著政黨政治的出現，政黨之間相互鬥爭的結果，最終還是會讓普遍選舉權出線。因此，平等選舉權必然會是一種無法不去面對的重要政治課題。此外，若是藉由平等選舉權當選的候選人可以再取得政治權力之後承擔政治上的責任，民主派政黨的作爲就會獲得廣泛接受。

關於教育，韋伯表示，教育文憑可說是一個人擁有的社會地位的象徵，因此也可以說，教育程度乃是個人公民權的基礎。雖然說教育文憑並不必然可以等同於「政治成熟」的表現，但是文憑卻還是一種社會地位的可能象徵，而文憑與取得養老俸祿之間的關聯，爲生活忙碌的工會領袖與小企業家應該最爲清楚。

爲了民族的永續生存，經濟生活的勞力市場就必須持續有人願意投入此種職業生活當中。對於願意承擔此種經濟工作的人士，給予最低限度的投票權乃是十分必要的，而此種權利便是普遍的選舉權。從經濟理性化的角度來說，工人與資本家雖然在社會上會彼此對立，在利益上卻是具有一致性。相形之下，這些人反而會與食奉祿爲生的公務人員會產生對立，因此，這也是爲何民選領袖要必須與官僚體制互相抗衡的原因之一，因爲政治領袖承擔了這些的一些想法與意志。

韋伯表示，「公社經濟」將成爲未來經濟原則的說法，不過是文人墨客一廂情願的說法，並非實質現實，畢竟，資本主義運作的真正邏輯乃是朝向理性化的發展方向，也就是說，理性計算的商業倫理才是現時資本主義時代的職業倫理，具有高度的理性化精神。在這個時代，營利並非依靠冒險與投機，反而是依靠「誠實爲上上策」的原則，而私人的商業官僚體制將與國家的官僚體制形成對立，會能發會制衡的力量，而這一切，都皆透過普遍選舉而把對抗意志託付給選出的政治領袖。

於本文中，韋伯表示，戰爭期間出現的「共同體經濟體」，其實並非一種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體制。原因就在於，此種職業團體並不具有「人民議會」的性質，僅可說是一種「利益集團代表機構」。因此緣故，此種利益團體並無法讓真正的政治領袖有機會浮出檯面。

韋伯認為，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各自有其獨立運作的一面，因此，把利益團體直接視為政治團體的觀點，便忽視了政治利益本身應該是一種自我運轉的獨立運作方式。也就是說，政治的要還給政治，唯有政黨政治的議會化運作可以保障政治朝向良性運作的一面。政黨派系已經是掌握政治機器的首要組織，因為政黨政治若真要取得權力，就勢必要表現出對於政治的熱忱與責任感。韋伯雖然承認並肯定政黨政治下彼此鬥爭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但是，他也一再強調，唯有政黨政治下的議會政治可以產生真正的政治領袖。

經濟社群與政治社群之間的關係，韋伯表示，一旦經濟社群決定在選舉性的政治社群內有所發揮，政治社群之間的相互鬥爭就會讓過度講求職業利益的行為盡量降低。關於德國帝國上議院的意見，不同於一般「文人墨客」的說法，韋伯認為，上議院不可能會變成人民代表大會，不過，上議院卻可以成為政黨政治的平衡者。原因就在於，原本上議院的成員皆隸屬於某個貴族階層，若是可以將上議院的成員可以改變成政治、經濟、學術或技術等層面的各種知識階層的話，那麼，上議院就會變成一種政治發展上雖有瑕疵卻仍舊有其用處的單位。

政治組織與利益組織基本上都是一種「自願性」的組織，是經過自由招募之後才形成的組織，因此必然是一種講究彼此鬥爭與相互妥協的組織，不過，官僚團體則是一種純粹講求密達成與績效的組織。作為由職業代表所組成的官辦組織，韋伯認為，要讓這些人的發言變得「有份量卻不算數」，也就是說，而其發言的份量程度，則是基於他是否願意在政治上就事論事地發表專家意見，切事地發表言論。畢竟，以政黨政治為主軸的現代國家，鬥爭的目的乃是透過吸引更多的選票來決定政策，因此，上議院的意見可以參考，下議院的政治實權則必須掌握。

不同於一般的「良善論述」，韋伯直接就把敵對性的鬥爭與妥協當成政治的本質，因為說穿了，政治基本上就是一種奪取政權的鬥爭。現代國家的政治特性主要是一種講求平等投票權的政體，因此，現代國家首次出現了「國家公民」的概念。因此緣故，原本直接從社會地位來看待人民的觀點已經不再適用，而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就有必要予以調整，畢竟國家的存在乃是為了保障所有公民的權益。所以，普遍選舉權與民主制度的確立，可說是現代國家必然都要面對的一種階段或考驗。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由於本年度的計畫是接續上個年度的計畫，所以，在運作上都較上個年度更為成熟，成員也已相當熟悉每個月的定期聚會。在討論過程中，已有參與教師和同學將會把讀書會中討論的相關成果進行發表。例如，今年元月份由本小組成員

所舉行的成果發表會，就使得讀書會成員能與台灣相關的韋伯研究者進行更多的互動和討論，對每一個成員而言都是相當有收穫與助益的。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由於讀書會的成員是跨校性的組合，因此，本年度讀書會在這半年執行過程依然遭遇上一年度的困難。因為大家都來自不同的地區與學校，爲了大家方便討論，目前讀書會的地點大部分都是借用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的研討教室來進行。不過，有一部分的同學是來自宜蘭佛光大學社會所，此外，也有部分教師是來自台中中山醫學大學，前往讀書會參與需要花上比較多的交通時間，再加上本年度的計畫只有半年可以執行，所以進行的頻率將往年爲高，大約每個月都會進行兩次左右，如遇個人因素就更不易前來參加，如此，容易降低同學的參與意願。這是讀書會運作上遭遇到的較爲棘手的難題。此外，跟去年相同，有部份曾參與的同學，由於已進行論文寫作階段，所以，常常不克前來參加，這也導致了部份成員的流失。

八、改進建議

由於讀書會組成成員中，仍有相當多人在台北進行較爲方便。所以，爲了使台北地區以外的成員能夠順利參加，一方面，會盡量利用經費補助往返的車資，另一方面，在的執行過程中，如果成員時間適合，將會考慮移往台北以外的地區（包括宜蘭、台中等）舉行。本年度在讀書會進行地點和時間上，我們已嘗試移往宜蘭佛光大學舉行兩次。這些措施都是在凝聚讀書會成員的共同意識前提下而進行。另外，參與同學因論文因素而流失的情形，目前希望透過招攬更多其他有興趣的同學來參加，來保持本讀書會多元的參與與對話空間。